

从教养式矫治到修复式教育: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

李 川

[摘 要] 最新立法中专门矫治教育替代收容教养制度不仅体现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制度转型,其背后更体现出从教养式矫治向修复式教育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受特殊预防论决定,未尊重未成年人特殊性的教养式矫治理念长期占据主导造成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实践出现社会排斥、公众信任危机、社会撕裂风险等问题,本质上体现出未成年人保护视野和修复式教育逻辑的缺位,因此,在最新刑法修正背景下,应向修复式教育进行逻辑和范式转换。修复式教育在发生学意义上由修复社会的司法理论与教育修复的未成年人保护需求决定,并受恢复性司法和受害人保护的理论基础交叉影响。未成年人修复式教育依据修复层次分为规范修复、受害修复和矫治对象修复三大机制,为保障其实现应建立受害方全流程参与的制度。

[关键词] 教养式矫治;修复式教育;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受害方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采取的必要处置措施作出重大修正,实施长达38年^①的劳动教养制度被专门教育矫治制度正式取代。同时,同期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专门教育矫治制度如何实施进一步做出了配套规定,并规定了专门教育矫治不仅对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必要时实施,对犯罪低龄未成年人还可以以一般性实施。由此可见,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整体发生了立法上的明确转型,专门教育矫治替代收容教养正式成为司法机关对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采取的必要措施。从形式层面而言,这一转型是针对收容教养长期存在的局部非司法化、非规范化、变相惩罚化之不足的纠偏;但从更深层次的教育矫治理念而言,这一制度转型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从长期问题重重、效果不佳的教养式矫治理念向内涵丰富、科学有效的修复式教育理念的矫治逻辑的更新与转换,并最终体现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范式的整体转变,必将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的当下实践与未来发展形成重大实质决定影响。因此需要在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对其背后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进行深入分析^②,以对后立法时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制度实践与规范发展提供有效的智识镜鉴。

李川,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江苏省青少年工作研究基地主任(南京211189)。本文系最高检察院理论课题“预防与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机制研究”(GJ2019C28)的研究成果,并受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242021S30018)、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的资助。

^①1982年3月23日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对因年龄问题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

^②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一、未成年人教养式矫治理念的实践难题与逻辑缺失

如果仅从长期受到诟病的规范化与司法化不足的形式局限层面出发,收容教养制度是可以进一步通过增加立法规范与进行司法化改革而得以存续完善的,并非是需要加以根本性替代的制度。然而,之所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这一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做根本性替代调整,是因为收容教养背后的教养式矫治理念的根本逻辑缺失。因此,如果只是将专门教育矫治的名称替代收容教养,而不对收容教养的教养式矫治理念做根本反思与修正,仍然无法破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中的种种实践难题。

(一) 未成年人教养式矫治的理论形塑及其制度影响

在收容教养制度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我国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理念虽然在形式上强调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特性,但是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与成年人的显著差异,都是将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与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等而视之,并以消除人身危险性为目标对其采取同等性质与强度的心理矫治与行为养成措施,因此,形成一种教养式矫治范式。^① 这种矫治范式的基础是教养式矫治理论。教养式矫治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刑法新派学说的环境决定说:即人的犯罪并不是行为人的随心所欲,而是由其自身特征结合社会环境特征所决定,罪错未成年人与成年犯罪人一样,其实施罪行的原因都是受实存的环境因素所决定而形成的越轨人格,“犯罪是由实施犯罪行为当时行为者的特性,加上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产生的”^②。既然受环境影响所决定的罪错人格是导致犯罪发生的核心原因,所以要有效减少违法犯罪、防范再犯,就需要依靠环境因素的重新设置来使得罪错人格恢复正常,从而长远上防范再犯。而进一步就设置修复罪错人格的正向环境机制而言,教养式矫治理论认为应考虑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一方面微观上面对个体罪错人格矫治的需求,应设置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环境,包括专门的心理教育与行为矫治机制,实现针对性的人格挽救;另一方面在宏观上考虑到罪错人格矫治后的长期维持,也要设置能够不与社会正常环境脱离、不被排斥的正向环境机制。此外,正向环境机制还要考虑到能够为行为提供养成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防止因社会排斥而人格再度恶化,形成再犯恶果。

正是由于上述理论发展渊源,受环境决定论在刑事处遇领域的权威性影响,教养式矫治论几乎主导了现代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成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理念的权威话语。^③ 在教养式矫治理念与范式的影响下,未成年人单纯监禁刑或关押式处遇的机制受到根本的质疑,因为单纯监禁的做法既无法形成对未成年人人格有效矫治的微观环境机制,也无法提供有效接触社会,养成正常社会生活能力的宏观环境机制。因此,更重视教育培养身心与更多接触社会,养成劳动技能与生活能力的劳动教养制度就因为与教养式矫治的理念更为符合而逐步替代单一监禁措施,成为未成年人矫治的主要实践做法。^④

(二) 教养式矫治作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理念的实践难题

毋庸置疑,教养式矫治的理念及其决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实践范式确实相对于旧有的一罚了之、一关了之的罪错未成年人处遇范式有明显的进步,起到了更好的防范再犯

^①张邵彦:《社区矫正在中国——基础分析、前景与困境》,《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

^②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③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

^④尹冷然:《欧洲涉罪未成年人参与诉讼考察及其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5期。

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教养式矫治范式所决定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相当的运行困境,体现出教养式矫治一元论的视野局限和逻辑难题。

首先,矫正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的未成年矫治对象承受了相当的社会排斥和融入困难问题,导致教养式矫治效果难以满足特殊预防的再犯防范期待。虽然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实践特别是从对未成年矫治对象保护的去标签化意义上淡化了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有罪之身”的身份标志,力求未成年矫治对象更好地复归融入社会,但是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主要强调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改造而对受害人与社区常常忽视,导致受害人与社区对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改造不满,未成年矫治对象在接受矫治后仍然受到了受害人及其社区的有意区隔和排斥,甚至出现了难以归化社会的现象。^①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教养式矫治效果,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因为无法回归正常社会角色而很可能选择再犯,特殊预防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效果充斥着不安全感和信任危机,教养式矫治措施常常得不到刑事政策上的公众支持。因为教养式矫治的理念过于强调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教育改造,而将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着眼点集中于未成年矫治对象自身,忽视了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与社会整体特别是受害人与社区的互动关系。由于教育改造的安全成效基于未成年矫治对象人身危险性的逐步改善从而效果缓慢,因此,对包括受害人及社区在内的公众的当下安全期待并没有明显满足,从而公众对教养式矫治的不安全感逐渐产生。^②特别是在教养式矫治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效果并未有较大改善或后果较远才能出现的情形下,对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信任危机则进一步加剧。

最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教养式矫治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制也没有从被害人及其代表的社会环境因素考量设置一定的和解机制,导致即便未成年人养成社会维系能力,也因被害人及其代表的社会因素排斥难以有效地复归社会。即便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未成年矫治对象通过教养式矫治消除了人身危险性而复归社会,但是其犯罪已经损害的社会关系并不会因此得到修复,因此,公众特别是受害人或社区所经验的治安风险并未得到改善,报复主义或社区分化等社会撕裂表征仍然持续累积,从而导致社会撕裂风险进一步增大,未成年矫治对象回归社会后的处境持续恶化。

(三) 教养式矫治实践难题背后的逻辑缺失

以上三方面问题体现出教养式矫治作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理念存在着根本性逻辑缺失,这是忽视了未成年人身心正在发育,受社会情境整体决定性影响较大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与成年人根本不同就在于其身心的脆弱性与受环境决定的可塑性,如果不从社会情境视角出发,就无法发现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相对于成年人的特殊社会修复内涵,进而造成未成年人再犯预防的失效。教养式矫治过于绝对的矫治对象中心主义和绝对个别化处遇机制实质上缺乏对未成年人特殊的社会保护的视野与社会修复的逻辑进路,因此,不仅教养式矫治的再犯预防效果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无法消除社会撕裂风险以及满足受害人或社区的权利保护需求,从而出现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根本性机能缺陷。

从修复式教育的角度出发,受害人与社区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在实施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措施时加以必要考量。一方面是受害人与社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方,从受害保护立场上应该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方案有一定的参与决策程序性权利,提出适当的对矫正方案的看法。保障这一权利有利于受害方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接纳。另一方面

^①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②李川:《修复、矫治与分控:社区矫正机能三重性辩证及其展开》,《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是受害人与社区应该获得有一定的定向补偿的权利。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部门应该考虑到未成年矫治对象对受害人与社区的损害,在设置教育矫治措施时特别采取面向受害人与社区的定向服务或定向赔偿等补偿性服务措施,通过劳动补偿等活动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与社区的利益补偿。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矫正对象形成责任承担意义,实现更好的人格矫治效果。当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未能考虑上述修复式教育要求,也未将受害人与社区作为修复对象予以考量时,上述面向受害人与社区的有效保护措施都无法实现从而失去了受害人与社区得到保护的机会,从而也就失去了未成年矫治对象更好地人格矫治、复归社会并被社会接纳的机会。

进一步言之,修复式教育的缺位导致了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不考虑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问题,不仅从矫治意义上不利于未成年矫治对象的复归社会,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撕裂风险。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受害人与社区的决策参与和权利补偿措施不仅可以保护受害人与社区的权益,更进一步有利于达成未成年矫治对象与受害人或社区代表之间的谅解,修复社会关系,这可以通过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邀请受害人或社区代表参加矫正圆桌会议或协商会议实现。^① 而从恢复性司法和社会风险管控的角度而言,这种社会关系的修复减少了社会进一步撕裂可能,防范了受害人报复和挫折攻击等可能社会危险行为以及未成年矫治对象被社会排斥的再犯风险,从风险管控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必要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措施。^② 然而,修复式教育理念的缺位导致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运行中较少考量这一社会关系修复的目标,从而也较少采取恢复社会关系、降低社会撕裂可能的措施,从风险管控的意义上讲也就无法控制社会撕裂的风险,不仅未成年矫治对象难以有效复归社会,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产生新的犯罪的较高可能性。

综言之,如果期望达成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社会安全保障和犯罪防范的基础目标,现有教养式矫治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理念就必须实现面向社会保护及修复的视野扩展和范式转型:从违法犯罪是对社会秩序破坏以及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是对犯罪的应然回应的意义上,这种转型就必须要考虑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所面对的修复式教育的多元化实践需求,实现向修复式教育范式的递嬗演进。

二、修复式教育理念的发生原理与理论谱系

修复式教育理念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相较于成年人的人格成长性与环境可塑特性,相对教养式矫治是更为科学合理的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理念。而就发生学基础与发展理论谱系而言,修复式教育绝非是教养式矫治自然发展更新的产物,而是有更为丰富的刑事司法时代背景与哲理基础。因此,只有深入检视修复式教育的发生原理,才能准确理解修复式教育的内涵机理,防止重蹈教养式矫治逻辑覆辙。

(一) 修复式教育理念的发生原理

修复式教育的产生植根于作为现代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制度背景的刑事司法理论与未成年人保护原理之中,^③修复社会的司法理论与教育修复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需求成为修复式教育理念的生成基础。

一方面,就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司法背景而言,近年来产生了基于社会视角的社会修复的新理论,成为修复式教育产生的制度前提。传统刑事司法理论围绕犯罪人——被害人展开,刑事司法的目标要

^①武玉红:《在社区矫正中犯罪受害人的参与和权利保护》,《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

^②李川:《三次被害视野下我国受害人研究之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③季晓军:《刑罚根据论的界定》,《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

么视为惩罚犯罪人实现受害人应报正义,要么视为改造犯罪人防范其实施再犯。^①然而,如此长期运行的刑事司法制度由于较少考虑犯罪的社会影响,就经常不得不面对诸如法律规范权威破坏、受刑人社会排斥等无法化解的社会难题。究其原因未将社会自身作为刑事司法功能对象纳入刑事司法功能考量。而随着近来社会连带主义与社群主义^②的理念影响,刑事司法领域也兴起了基于社会本位的社会修复的司法理论,要求刑事司法不仅要注重受害人应报与犯罪人矫治,还应将被破坏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修复纳入刑事司法的目标考量,设置相应的程序机制。由此,刑事司法的机能就被纳入社会稳定与和谐为取向的社会治理领域^③,以社会修复为目标的修复式教育自然就有了生成土壤。

另一方面就未成年人保护原理而言,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影响下,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不再单纯强调一般心理辅导与行为纠正式的矫正式教育。这是因为矫正式教育往往较少考虑未成年人的社会情境影响,从而忽视了未成年人更容易遭受社会影响的特殊规律,出现矫正效果不良的问题。^④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未成年人的保护,最大化未成年人司法教育的效果,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矫治教育时就需要更进一步考虑社会情境的影响,修复未成年人不良或破裂的社会关系,形成其正向的社会决定情境。这种教育修复的司法教育理念自然就在逻辑上催生了未成年人矫治时的修复式教育理念。

（二）修复式教育理念发展的理论谱系

除了在发生学意义上受到了修复社会的司法理论与教育修复的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的决定,修复式教育的理论发展还体现了刑事司法两大新兴理论即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保护的支配性影响,修复式教育在具体机制层面上受到了恢复性司法和被害人保护的交叉形塑。

1. 恢复性司法提供修复式教育的架构维度

恢复性司法本身作为一种刑事司法理念与以往关注国家追诉犯罪需要和刑法权威实现^⑤的着眼点不同,其重点关注受害人、社区以及矫治对象的具体需求,因此,与传统刑事司法运作中忽视社会关系撕裂与被害权利补偿之问题形成鲜明对比,是一种以修复式教育和尊重受害方地位为核心的新兴司法进路。^⑥这一进路希望通过未成年矫治对象与受害人或社区等受影响主体协商交流的方式在刑事司法中实现各方需求共赢的局面:在共同协议和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未成年矫治对象可以接受教育,诚心悔罪,取得受害人谅解从而减轻所受刑事制裁和回归社会的排斥;^⑦受害人可以主动提出补偿需求和积极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从而突出体现独立的参与地位和更好实现自我权利的主动保障;而社区或社会代表可以修补受到伤害的社区秩序和社会关系,不必为矫治对象回归社会的风险而担忧。^⑧因此,恢复性司法体现了社会本位、修复优先、受害保护及和谐主义的价值理念,为传统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增加了全新的修复式矫治教育框架与维度,从风险管控视角而言就是通过这种修复满足了受害人正义需求和保障了未成年矫治对象复归顺利,从而降低了社会撕裂风险。^⑨

虽然恢复性司法由于补充性的全新机能视野,一经实践就迅速得到推广和发展,甚至成为世界

①[意]恩里科·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②郁建兴、吕明再:《治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再出发》,《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③康亚林、陈先书:《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学术界》2003年第6期。

④[英]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刘志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59页。

⑤刘军:《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⑥刘艳红、李川:《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以A市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和预防现状为调研对象》,《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

⑦黎宏:《刑事和解:一种新的刑罚改革理念》,《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⑧李川:《基于风险管控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⑨[英]格里·约翰斯通:《恢复性司法:理念、价值与争议》,郝方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刑事司法流行的制度理念,但其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着眼重点却始终放在判决做出之前,而在判决后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阶段之地位和作用常常得不到重视,导致具备恢复性司法意涵的很多下位成熟实践机制如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等都发生在判决前的诉讼流程之中。^①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恰恰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未成年矫治对象的社会复归和融入问题、受害人的谅解问题以及社会关系的恢复问题,随着未成年矫治对象回归社会的进程变得愈加需要考量和解决,社会安全风险最可能增大的阶段不是判决前进程,而是判决后执行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阶段。^② 所以就对恢复性司法的实践需求而言,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阶段更应秉持恢复性司法的精神,设置相应的司法修复措施,并将其与未成年人的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2. 受害人保护提供修复式教育的路径机制

受害人保护是二战以来兴起的受害人学理论的基本目标和出发点,是随着受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注重,在反思刑事司法过于强调刑事追诉和维护刑法权威的背景下兴起的刑事司法领域的另一重要思潮。传统国家垄断刑事追诉权的特征下,受害人逐渐沦为证人和一般参与人的诉讼角色,曾经长期成为刑事司法忽视的对象。然而在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影响下,受害人逐渐受到了刑事司法理念和实践的重视,更在受害人学理论兴起和发展的带动下,形成受害人保护的权威理念,并为修复式矫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路径机制:如多国实践中诞生的受害人赔偿法律明确了政府、社会与违法犯罪者的救济责任、刑事追诉和审判中将受害人地位提升和权利完善,通过刑事和解和协商增强受害人对矫治对象的主动权等都大大增强了刑事司法中受害人保护的力度,促进了受害人在矫治教育中的参与地位和具体机能。^③

一方面,未成年矫治对象能有效融入回归社会的重要条件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害人及其所在的社区环境的接纳与认可。通过被害人保护机制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针对这一目标给予受害人一定的保护和关注,参与表达、获得补偿的受害人自然容易形成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谅解,受其影响受害人所在的环境也容易放弃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排斥,导致其相对顺利复归社会,实现修复式教育的目标。^④ 另一方面,通过被害人保护机制中的受害人建议以及未成年矫治对象——受害人交流沟通机制可以实现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良好机能,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能够更快更深刻地接受到受害人被害信息从而有利于悔过修复,加快教育矫治进程,增加修复式教育的效果和效率。但实践中在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阶段的未成年矫治对象——受害人交流沟通还较为缺乏,被害人保护机制难以发挥修复机能。

恢复性司法与受害人保护逻辑上都强调了社会保护与受害人参与的重要性,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可以实现对修复式教育的统一形塑,许多修复式教育功能突出的机制如未成年矫治对象——受害人协商制度往往具有双重内涵,既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也服务于受害人保护需求。

三、修复式教育范式下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机制扩展

2020 年我国修订了《刑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重要目的就是设置更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新机制。但《刑法》仅是原则性的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字眼取代了“收容教养”制度;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相对更明确地规定了专门矫治教育的对象与实

①吴立志:《恢复性司法基本理念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②姚建龙:《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③何挺:《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适用于成年人案件的新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

④L. Sebba, *Third Parties, Victim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 50.

施场所,设置了专门矫治教育的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但也未明确阐明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教育理念与运行模式。由此,就造成了接下来对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发展与运行起决定作用的亟待解答的问题: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应采何种基本范式?在这一范式下应如何设置与运行矫治教育的具体机制?如果两法修改只是搭起了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的框架而仍然采用旧有的教养式矫治理念与范式,必然造成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名实背离与再度走偏,威胁其健康发展与运行效果。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教养式矫治范式的缺陷而提出的,与未成年人心身特殊性相适应的修复式教育范式就应承担起指导与决定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制的重要机能,在两法修订体现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变革的大背景下,保证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修复式教育相对于传统教养式矫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着眼于整体社会秩序的修补恢复对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特殊满足机能。就修复式教育的基础哲理认知而言,犯罪或类犯罪违法行为不仅是单纯具体的法益侵害,并进一步超越具体侵害结果带来社会多层面的连锁破坏风险,只有修复了这些多层次风险才能最终实现刑事矫治教育的机能。未成年人作为受到社会决定性影响的特殊主体,这种多层次的风险修复对其矫治教育尤为关键。因此,对未成年人的修复式教育范式核心就是通过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保护的具体理论逻辑,引入社会保护视野与社会修复机制,通过对社会风险的修复,多层次、全方位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科学教育矫治,长远防范再犯可能性。^①

修复式教育的必要优势就在于明确了要实现未成年教育矫治的有效目标,就必须考量对违法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损害进行修复。根据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破坏风险提示的修复需求,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应体现为对社会规范、受害人与社区、未成年矫治对象自身三个层面上破坏的修复,最终形成对未成年人的修复式教育,使得未成年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防范长远再犯。所以,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修复式教育也区分为旨在恢复权威的规范修复机制、旨在达成加害受害和解的受害修复机制、旨在矫治对象社会复归的矫治对象修复机制。未来《刑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实践展开应按照修复式教育的层次要求,实现有别于教养式矫治的机制扩展。

(一) 规范修复机制及其机制扩展

未成年人修复式教育在直接对象意义上是指对规范权威和效力的恢复。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造成具体的社会危害,还在一般意义上对法律规范的效力与权威造成直接破坏,并对法律规范背后的伦理规范等造成进一步伤害,因此,产生了规范权威与效力修复的需求。^②这一恢复过程主要依靠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相结合的双面预防机制实现。这一机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消极预防,即通过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威慑机能使未成年矫治对象认识到规范的权威和效力,形成对规范的尊重;二是积极预防,即通过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的规范教育,包括法治教育和道德价值观教育等使得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矫正对象内心形成对规范的自觉认可和接受,具备道德和法治信仰与意识。^③

而要保障这一机制的完成,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就必须采用规范价值修复的方式:一方面是指对未成年矫治对象注重进行规范教育,如通过专门学校内针对未成年人心身特点专设的的法治规范与道德伦理规范教育等方式,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能够体验式的认知社会规范对个体与社会维系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认识到部分社会规范强制性与权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对规范的尊重也是个体与社会

^①李川:《从特殊预防到风险管控:社区矫正之理论嬗变与进路选择》,《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

^②孙海波:《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论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法学论坛》2014年第1期。

^③E. Van den Hagg, *Punishing Criminals: 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 N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1, p. 67.

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从而形成对规范的内心自觉接受与信服,使得尊重社会规范成为未成年矫治对象的自觉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通过未成年矫治对象——受害人的交流机制使得受害人与社区认识到未成年矫治对象对违反规范价值的悔过态度和不再犯保证,从而意识到规范地位得到了维系和保障,可以重塑其内心因为受到侵害而被破坏的规范价值,修复规范意识。

(二) 受害修复机制及其机制扩展

未成年人修复式教育在具体对象的意义上是指通过教育引导达成加害人与受害人和解,加害人对受害人与社区进行补偿恢复。无论是受害人或社区的权利或利益,都需要加以补偿恢复,社区甚至国家可以选派代表,行使与受害人相同的受偿权益。传统司法虽然有民事诉讼救济,但常常无法落实,且对无受害人犯罪更没有具体的对受害社区的补偿恢复措施,^①导致受害人与社区的补偿恢复需求落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从具体对象层次上应该以对受害人与社区的补偿恢复为具体目标,进而通过受害补偿实现对未成年矫治对象更好的教育与社会复归效果。

一是受害人与社区应该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享有知情权与建议权,可以通过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关了解到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服刑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意见和建议,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关应当酌情考量。二是受害人应该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享有受补偿的权利,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关应当安排未成年矫治对象尽可能采取对受害人与社区的倾斜性补偿措施,如补偿性劳动等。三是受害人应该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过程中享有交流磋商权。未成年人矫治教育机关应当采取未成年矫治对象——受害人圆桌会议、咨商小组和定期会见制度等形式促进未成年矫治对象向受害人的赔偿道歉和交流悔过,以取得受害人与社区的谅解。^②

(三) 矫治对象修复机制及其机制扩展

未成年人修复式教育在本源意义上还是指实现未成年矫治对象的社会回归恢复。未成年矫治对象的罪错人格在特定意义上是被负面社会环境影响形成的,罪错人格进一步造成了未成年矫治对象与社会正常环境的背离与矛盾,而这种背离与矛盾又进一步加重了未成年矫治对象的罪错人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修复的深层目标就是矫正改造未成年矫治对象,打破罪错人格与社会背离的恶性循环,使其恢复正常人格,并无害复归融入社会,通过社会复归融入进一步维系正常人格。对未成年矫治对象的社会回归恢复,需要人格矫治和复归社会两种机制相辅相成的配合,形成正向互促。

一方面,未成年人人格矫治机制可以矫正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扭曲人格和反社会特征,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恢复正常人格状态,消除其对社会损害的风险,自然就修复了可能造成的社会秩序破坏,具备复归社会的前提;^③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复归社会机制与人格矫治在逻辑上紧密相关,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复归社会机制防范矫治后的人格再行恶化,巩固人格矫治的长远效果。未成年人复归社会机制的核心主要体现为修复协商机制。修复协商机制是指通过未成年矫治对象与受害人及社区的交流协商,未成年矫治对象通过真诚悔罪取得受害人与社区的接纳谅解,从而极大减少了未成年矫治对象回归社会的阻力,使得未成年矫治对象可以顺利地融入社会,消除再犯可能性,恢复社会秩序。^④

^①如对环境犯罪破坏的整体生态利益,最近还在探索由检察机关或团体代表国家或社区主张救济的机制,传统民事诉讼救济无力解决。

^②于改之、吴玉萍:《多元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③房保国:《受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④刘艳红:《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法学》2011年第11期。

四、结语

在修复式教育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全新范式下,受害人与社区的参与在未成年人矫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其并非是作为辅助改造未成年矫治对象的次要机制出现,而是作为区别于教养式矫治的、体现更全面的社会保护和修复的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目标的关键机制而存在的,同时能够充分表达规范修复、受害修复和未成年矫治对象的复合内涵。^① 受此机制决定,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实践中必须形成以受害方知情权和建议权保障机制、未成年矫治对象与受害人交流谘商机制、受害方定向服务补偿机制、受害方参与评估机制为核心的系统性受害方参与制度体系,这是未来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必须重视的机能扩展方向。

(责任编辑:蒋永华)

From Upbringing Correction to Restorative Education: Conceptual Renewal and Paradigm Conversion of Corrective Education for Minors

LI Chuan

Abstract: In the latest legislation, the special correctional education replacing the det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ystem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 for minor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ncept renewal and paradigm shift from upbringing correction to restorative education. Decided by the theory of special prevention, the concept of upbringing correction that does not respect the particularity of minors has long been dominant, resulting in such major problems as social exclusion, public trust crisis, and lack of victim prote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 for minors. All this reflects the absence of vision in providing protection for minors and the logic of restoration education.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st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a logic and paradigm shift should be made to restorative education. Restorative edu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needs of hum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genetic sense, and is cross-influenced b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victim protection. Juvenile restorative education includes three major mechanisms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restoration: i. e., norm restoration, victim restoration, and corrected object restoration. To ensure its realization, a mechanism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victim's full-process participation.

Keywords: upbringing correction; restorative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 for minors; participation of the victim

About the author: LI Chuan,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

^①郑列、马放飞:《社区矫正的新发展——恢复性司法的运用》,《犯罪研究》2007年第4期。